

民间文化新经典译丛

主编 刘魁立

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

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

[美] 理查德·鲍曼 (Richard Bauman) 著

杨利慧 安德明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民间文化新经典译丛

主编 刘魁立

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

[美] 理查德·鲍曼 (Richard Bauman) 著

杨利慧 安德明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美)鲍曼(Bauman,R.)著;杨利慧,安德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0

(学术文库·民间文化新经典译丛)

ISBN 978-7-5633-7728-2

I. 作… II. ①鲍…②杨…③安… III. 表演学—研究
IV. J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121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19 字数:160千字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4 000 定价: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民间文化新经典译丛”总序

我曾经主编过一套翻译著作丛书,名为“原始文化名著译丛”,那里所收的外国学人的作品大都是经历过上百年历史考验的学术名著。20年前翻译出版这套著作自有它的历史背景。关于编辑的初衷,我曾经这样记述过:

……长时间对国外的学术发展闭目塞听的封闭状态,使我们缺少了参考和比较,限制了中国学者才智的发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使我们进步缓慢,研究难以深入,甚至使我们的许多优长也渐渐失去光泽,有的甚至变成不断重复的陈词滥调。大家都痛感有尽快改变这种落后状况的必要。为此,首先要运用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深入实际,全面掌握和分析民间文化的现实状况和真实材料;同时还要总结和借鉴人类智慧之光已经照亮的科学发展道路,包括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已经走过的探索历程……为了认识和分析当代外国的五光十色的新理论、新观点,我认为有必要以简捷的办法和较快的速度追视其历史,明了其根源,这样才不至于在这些时新论调的绚丽的外衣和炫目的光彩面前感到困惑莫解。于是,1985年开始,我策划主编了一套“原始文化名

著译丛”，希望能把欧洲民间文化研究最基本的理论著作介绍给国人，尽快填补这一空白，免去学人再在二三流著作上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我希望我国学界能在较短时间内迎头赶上，充分利用我国的优越条件，作出我们出色的贡献，在广泛的国际学术对话中发出更高更强的声音。

这套丛书陆续出版之后，很快就销售一空。20年过去，至今学界对它仍有需求，于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重新再版。我以为，像《原始文化》、《人类学》、《金枝(精要)》、《图腾崇拜》等著作仍是有关学者不能不读，而且是常读常新的经典。

然而，和一切事物一样，学术思想总不会停滞不前，总要不断发展。新的材料、新的视角、新的立论、新的学说体系总会不断涌现。半个世纪以来，在国外学坛的民间文化研究领域也确实出现了不少堪称“经典”的学术著作。于是我想，应该不断地将国外学人的新成果纳入我国学者的视野，成为我们学术建设的参照。这不仅会活跃我们的思路，对我们的研究有益，而且会日益增加我们在国际学术对话中的共同语言。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翻译工作，虽不及日本等一些国家介绍国外学术进程的快速和全面，但是，我们今天在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有一批十分在行的中青年学人，他们有理论功底和分辨眼光，能够把国外有关领域的最有新见、最有影响的著作选择出来，提供我国学人参考。于是，在四五年前，在和一些同道商议之后，确定编辑出版一套“民间文化新经典译丛”，作为“原始文化名著译丛”的姊妹篇和当代续集。在这一段时间里，有过一些周折，现在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承

担出版重任,这对学界同人说来是一大事,对各位译者说来也是一大事。

民间文化饱含着民众生活方式的历史积淀,同时又是今天的生活现实。当我们说要继承和弘扬民间文化优良传统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要关爱、保护和发展我们的生存环境和优良的生活方式。这种关爱、保护和发展当然是在充分认识民间文化的本质、形式、功能、价值、既往历史和未来趋向等的基础之上。因此可以说,研究是保护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它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国外的研究虽然对象不同,视角有异,然而他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会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我们的民间文化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内容极为丰富,为世界其他民族所少见。由于这一层原因,也由于有关学者的艰辛努力,我们在国际学术论坛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我们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不断地把握世界学术的脉搏,不断追踪国际学术发展的进程,以利于我们对自己民间文化的认识和研究,以利于作出新的学术建树,从而使我们的保护和弘扬民间文化有更坚实的基础。

在谈到保护和弘扬民间文化优良传统的时候,以往我们更多的是从本国民众福祉以及民族文化发展前景的角度出发,这种视角当然是有道理的,是正确的。然而,到了今天,世界变成了不是修辞意义上的而是确有实际所指的“地球村”的时候,仅有民族的视角就是不够的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可能会影响到人类文化发展的单一化,强势文化也在有意无意地鼓吹和助长着文化发展的单一化趋势,然而,单一化

终将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悲哀。文化多样性发展不仅是世界各民族的需求,而且是人类社会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为了给文化多样性发展创造更多更有利的条件,我们不仅要加强本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而且要广泛地吸纳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扩大交流,不断展开国际学术对话。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殷切期望这套“民间文化新经典译丛”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民间文化是一泓永不涸竭的生命之泉,是一棵永世长青的生命树。我们的中华民族、我们的整个人类社会,因为有了这生命树,有了这生命泉,才会赢得一个更健康、更幸福、更和谐、更绚丽的明天。

刘魁立

2008年1月于北京

译者的话

表演理论 (Performance Theory), 有人称之为“美国表演学派”(American Performance School), 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在美国民俗学界兴起的一种重要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其影响力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上半期臻至顶峰——有人曾经开玩笑说, 在这期间参加美国民俗学会年会, 无论你推开哪个讨论会的门, 都会听见人们正在热烈地谈论“表演”。这一理论视角, 至今仍然在民俗学领域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同时, 它还对世界范围内的其他诸多学科——如人类学、语言学、文学批评、宗教研究、音乐、戏剧、话语研究、区域研究、讲演与大众传媒等——的相关研究产生了影响, 从而为民俗学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中国民俗学界对表演理论的兴趣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了。1985 年, 阎云翔在《民间故事的表演性》(《民间文学》1985 年第 7 期)一文中, 较早地对这一理论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此后, 高丙中、朝戈金、巴莫曲布嫫等分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进行过稍多的介绍, 与此同时, 一些学者(例如江帆、柯扬等)也开始尝试借鉴相关的概念和视角来进行民间故事和民歌等的研究。自 20 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 随着国内学术思想领域更趋开放, 对新颖的、富有阐释力的理论

和方法的渴望日益增加,民俗学界对表演理论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甚至一段时期内,“表演”一词在学者和学生中间都颇为流行,谈之者甚众。但是,迄今为止,除了个别章节的翻译(例如翟胜德曾翻译了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中的“对表演的设定”一节,发表在《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增刊上)以及个别著述中的简要介绍之外,国内对表演理论的相关论著一直没有予以系统的翻译,大多数人对它的了解只能经由他人的简要介绍而辗转获得,这不能不影响到对“表演”概念的恰当理解以及对表演视角的有效运用。因此,我们希望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能够为弥补这一缺憾并促进国内学界对相关理论和方法的认识与理解,尽一份力量。

本书作者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教授,是表演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卓越的民俗学家和语言人类学家。

鲍曼 1940 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地区。他从小就在与当地说西班牙语的人的接触中学会了西班牙语,这为他日后在墨西哥及美国的西班牙语区进行民俗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他于 1961 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62 年在印第安纳大学获得民俗学硕士学位,1968 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美国研究博士学位和人类学硕士学位。1970 年至 1986 年,他在得克萨斯大学任教,并在该校创立了民俗学与民族音乐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从 1986 年至今,鲍曼一直在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系(后更名为民俗学与民族音乐学系)任教授,其间曾先后两度担任系主任;同时,他也是他所协助创建的印大传播与文化系的教授,并兼任该校人类学、美国研究、文化研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研究等专业的教授,还于 1992 年至 1998 年期

间兼任印大语言与符号研究中心的主任。1991年,他获得了印大“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的职位。此外,在相关的各种学术机构当中,鲍曼也扮演了十分活跃的角色,曾任美国符号学会会长(1981)、语言人类学会会长(1991—1993)、《美国民俗学杂志》主编(1981—1985)、美国民俗学会资深会员委员会主席(1990—1992)及美国人类学会理事(1991—1993)等职务。

从大学到博士阶段接受的不同训练,使鲍曼形成了广泛多样的理论兴趣和研究视野。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结合了雅格布森及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海姆斯的交流民族志、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的人类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等多种学科的观点和视角,跨学科研究是他研究方法中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也正是他能够在民俗学、语言人类学、符号学和传播学等诸多领域都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当然,鲍曼最主要的工作和成就,还是集中在民俗学和语言人类学当中。他对于探索口头语言艺术的一种新视角——表演的视角——系统而深入的阐述,为他在民俗学、语言人类学等学科中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在鲍曼看来,口头艺术是一种表演,表演则是一种交流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表演者要对观众承担展示自己交流技巧的责任,而他使交流行为得以完成的相关技巧和效果会受到观众的品评,观众则会通过对表达行为本身内在品质的现场欣赏而得到经验的升华。围绕这一核心观点,他提出了一系列用来规定和分析表演的概念,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这种建构,为民俗学和语言人类学界有关口头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也极大地深化了这两个学科中逐渐形成的从表演的视角理解口头艺术的认识。正因为这样,一些学者

把以鲍曼为代表人物的表演理论的出现称作一场方法论上的革命。

鲍曼对于表演理论的兴趣,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哲学社会思想运动的新潮流和民俗学、人类学学科本身所发生的新转向影响下,在与一批志趣相投的同行相互激发下形成的(参见本书《中译本序言》及附录三、附录四)。但是,他围绕“表演”问题而作的思考,在概念体系的严密、理论思考的深度等方面,超过了许多对这一核心概念怀有兴趣的同行。这一方面是由于鲍曼本人具有缜密的逻辑思考能力,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在苏格兰、墨西哥及美国得克萨斯、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等地所作的关于口头艺术的深入的田野研究,为他奠定了扎实的民族志资料基础,尤其重要的,则是由于他还有着更高的学术追求。那就是,他之所以关注“表演”,是为了解答人类社会何以达成的问题。具体而言,这一问题在他那里就是:人们拥有怎样的交流资源,才能使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得到实现?而象征的形式、艺术的形式又是怎样被当作社会生活的资源来应用的?这种对于社会生活的关心,是鲍曼有关表演的思考的出发点,也始终贯穿在他长期的研究当中,成了决定他的表演理论特征的根本要素。

2000 年 8 月至 2001 年 8 月,我们夫妇有幸同时获得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在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学与民族音乐学系做访问学者。我们选择印大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想跟随鲍曼教授深入、系统地了解表演理论。因此,在那一年当中,我们同他保持了积极的联系,除了旁听他开设的“社会语言符号学基础”、“表演的理论和方法”和“表演理论与信息传播”三门研究生课程以外,还对他进行了几次专门的访谈

(见本书附录三)。在课堂上和访谈中,我们对鲍曼作为一位学术大家的睿智、深刻和渊博,有了切身的感受。对于学生和我们提出的各种学术问题,他都能旁征博引地予以解答并提出富于建设性的指导意见,这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他还是一位十分优秀的老师。

在同鲍曼一年的交往中,有两件小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件是初次见到鲍曼时,觉得他似乎不苟言笑,显得比较威严,这让对他心存敬仰的我们,颇有些紧张。但是,当他在听到我们以“鲍曼教授”来称呼他时,马上就告诉我们:“叫我迪克”(迪克是他的名字理查德的昵称)。这一下让我们感到,他实际上是那种外冷里热、宽厚善良的人。后来同他联系多了,这种感觉逐渐得到了证实,我们同他的距离也拉近了许多。

另一件事,是2001年夏天当我们快要结束在印大的访学时,我们应邀去鲍曼和斯道杰(Beverly Stoeltje)教授家吃晚饭。闲谈之间,说到个人业余爱好,德明对鲍曼说:“真没想到,您也会有这些爱好!在我们的印象中,您应该是一位只钻研学问的哲学家。”鲍曼一听,马上说:“我给你看样东西。”接着转身进了卧室。很快又拿着一本杂志兴冲冲地走出来,对德明说:“这就是‘哲学家’做的事!”那是一本有关帆船运动的杂志,里面有许多精美图片,介绍各式帆船和运动技巧。斯道杰教授告诉我们,帆船是鲍曼最喜欢的运动。

2005年春节期间,鲍曼和斯道杰夫妇应邀来北京参加国际会议。我们负责联系和协助接待工作,并同王娟博士一道,安排他们先后在中国社科院、北师大和北大作了系列学术讲演。两个星期的接触,使我们对鲍曼的性格有了更深的了解,发现他在日常交往中话不是很

多,有时甚至还有些腼腆;但真正与人交谈时,却是话锋机智,十分幽默、随和。那两个星期当中,鲍曼夫妇同北京民俗学界的许多同行都有多次直接的交流,这既让他们有了进一步了解中国民俗学的机会,也让中国同行对这位表演理论大家的风采有了切实的感受。也正是在这一年,我们同鲍曼最后确定了本书的篇目和体例。

迄今为止,鲍曼一共出版了7部专著、6部主编著作,发表了54篇论文和43篇为他人主编的书撰写的章节。这些论著中,有不少都曾被多次再版。

《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是鲍曼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它首先是作者发表于1975年的一篇论文,1977年又以该文为基础增补扩充为单行本问世。关于这篇论文及同名单行本的形成过程,本书作者在《中译本序言》中已有详细交代,这里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表演理论方面的一部纲领性著作,《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单行本是与表演理论相关的著述中被征引最多、最富影响的一部,曾被无数次地重印(参见本书附录四),而论文《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则在2001年被《美国人类学家》杂志评为20世纪的一百年间该杂志发表的最有影响的四篇文章之一。

鲍曼另外一部表演理论方面的重要著作,是《故事、表演和事件——从语境研究口头叙事》(*Story, Performance, and Event: Contextual Studies of Oral Narrative*, 1986)。这是一部运用他在《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中所建立的以表演为中心的范式来进行具体研究的成果,主要分析的是作者所搜集的在得克萨斯流传的口头叙事。由于该书为

表演理论的具体实践提供了典型的个案，因此也经常被学界同行所关注和引用。

鲍曼近年来连续出版的两部著作，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誉。其中一部是《他者的言语世界——跨文化视角下的互文性》(*A World of Others' Words: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Intertextuality*, 2004)，该书由于对互文问题的深刻阐释而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表演理论的体系。另一部是他与查尔斯·布瑞格斯(Charles Briggs)合著的《现代性之声——语言意识形态与不平等政治》(*Voices of Modernity: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Politics of Inequality*, 2003)，此书由于“成功地探讨了语言意识形态在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并“使语言人类学参与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讨论”，从而获得了语言人类学会颁发的著名的爱德华·萨丕尔图书奖(2006年度)。

2000年，我们在到达印第安纳大学不久，就向鲍曼表示了希望翻译他有关表演理论的代表作的想法。当时他推荐给我们的，是1977年由纽博瑞出版公司(Newbury House Publishers)出版的《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单行本，而我们也从那时就开始了围绕该书进行翻译的准备工作。但后来，随着同鲍曼教授的接触逐渐增多以及对表演理论的了解逐渐深入，我们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相关研究以来，鲍曼有关“表演”的观点实际上始终处于发展当中，而《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单行本问世已有二十多年，在此期间，他对相关问题又有了许多新的思考。显然，仅仅翻译该书，已不能反映出其观念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另外，我们自2001年夏秋间回国后，也曾通过撰文、讲座和授课等方式，向同事和学生介绍有关表演理论的视角和方法，利慧

还曾在所任职的北京师范大学，让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阅读并讨论《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一书。在此过程中，许多人反映：虽然“表演”的视角富有启发性，《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一书也言简意赅，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可是，由于缺乏比较有力的个案，对于如何在具体实践中运用这一理论和方法，读者却仍然心有困惑。由于上述两个原因，我们考虑再三，决定修改原来的翻译计划，从翻译一本现成的书（《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单行本），改为重新编辑并翻译一本书。为此，我们经过多次与鲍曼教授的商议，最终于2005年一同择定了本书正文部分现有的篇目。

这些文章，最早的发表于1975年（第一篇：《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最晚的发表于2005年（第三篇：《表演》词条），其间跨越了三十年的时光。第一篇论文无疑是纲领性的，其后的第二、三、四篇文章则分别使用了不同的语汇、从不同的学术角度，对“表演”的核心理念、特征、学术传统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等进行了梳理。需要注意的是，其中的表演，有时指的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性的言说方式——这是鲍曼教授本人学术研究的核心——有时还包括了更广泛的“文化表演”。《口头传统研究中的表演民族志》是从民族志的角度，对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进行的探讨。与鲍曼的其他一些文章相比，这篇文章明白晓畅，而且有精要的案例分析，是了解表演理论的很好范文。《表演的否认》是理论性很强的个案研究文章，其中最具有启发性的一点，是为如何使用表演的观念对以往田野工作中搜集的资料予以分析提供了范例。《13世纪冰岛的表演与荣誉》是鲍曼最为得意的文章之一，它使用了表演的框架来分析13世纪冰岛的文献资料，以阐明表

演视角可能具有的启示意义。这篇文章对于擅长使用历史资料和文献记录的中国学者来说,也许尤其具有参考价值。这些文章,除第四、五两篇是与他人合作撰写之外,其余都是鲍曼教授个人的研究成果。我们期望能够通过这些文章的组合,既比较系统地呈现鲍曼教授有关表演的主要观点,又能反映其发展变化(例如把“文化表演”的概念纳入其中、关于表演的自反性的认识等);既能展示其理论的核心和要义,又能为如何运用该理论提供个案样例。

鲍曼 2005 年在北师大、中国社科院和北大所作的学术讲演,对表演理论的重要概念及其在相关问题上的新思考,作了集中而简约的介绍。本书附录部分收入了其中两次讲演的内容,它们将有助于读者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作者的思想以及其间变化的印记。此外,附录中还包括了我们在印大期间对鲍曼教授所作的访谈,在访谈中鲍曼细致地谈论了自己有关表演方法的形成过程、这一方法的根本理论旨趣及其对于美国民俗学所具有的转折性意义和对于其他学科所带来的影响等。附录的最后,是杨利慧在学习这一理论视角和方法的过程中撰写的两篇分别对表演理论和民族志诗学进行综合评述的文章,前者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表演理论兴起的学术背景、主要理论主张、个案实践、学术影响以及对它的反思与批评等,后者则具体介绍了民族志诗学的有关理论和实践——因为从理论主张、思想基础、代表人物等方面来看,民族志诗学都可以说是表演理论大阵营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将这两篇文章忝列于此,只是希望能对读者从整体上更广泛地了解表演理论多少有所帮助。

术语的翻译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常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键词“performance”,有人译为“展演”,有人译为“演述”,我们以为也许“展演”一词更好些,然而由于多数人译为“表演”,而且自1980年代迄今,学者和学生也已经逐渐熟悉了“表演理论”的提法,所以,我们也依例采取“表演”的译法。“Emergent quality of performance”,有人译为“突生性”,有人译为“即时性”,我们在以往发表的文章中也参考了他人的译法,将之称为“即时性”;但是此番翻译过程中又反复重新斟酌,并与尹虎彬以及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民俗学博士学位的李靖等商议,最后觉得译为“新生性”更好些(“新兴性”也许更恰当,但是中文读起来有些拗口,只好舍弃)。我们以往发表的一些相关文章,收入本书前,也参照全书的翻译对术语和人名做了统一(例如“即时性”改为“新生性”、“海默斯”改为“海姆斯”等)。需要交代的是:为免去不必要的重复,书中所有的人名和书名等,其英文原名一般只在第一次出现时以括号形式注明,其后不再赘述。对原书和文章中提及的重要人物和事象,我们都尽可能增加了相关的说明和解释,在脚注中以“译者注”的形式出现。为方便读者直接查找和核对原文,原书及论文后所附的参考书目,都没有译成中文。

书中第一、二、三、五、六各篇文章,由杨利慧翻译,第四、七篇文章由安德明翻译。全书由安德明统稿并校正了所有的译文。

2000年的秋天,我们已决意要翻译《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但是其后由于翻译计划的改变,也由于其他各种科研任务的牵扯,使得翻译工作一直时断时续,直到近八年后的今天才终于完成了目前的译本。鲍曼教授学识渊博,视野开阔,思想深邃,其著述常常广泛地涉及